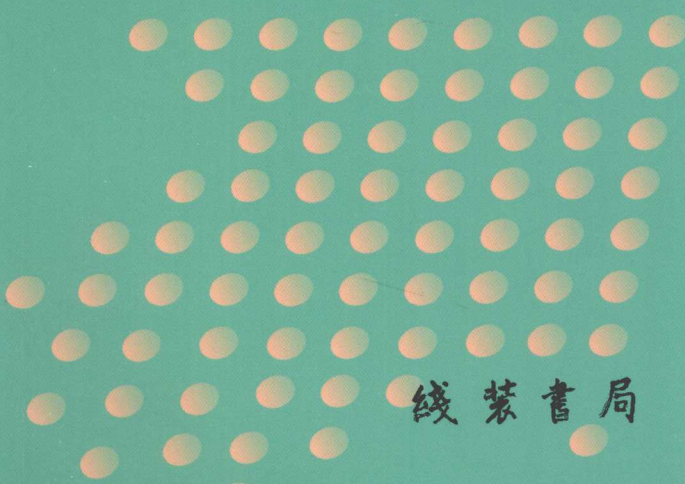


社科文献论丛第14辑 / 姬汝茂主编

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问题研究

何保林◎主编

ZHONGGUOSHEHUIZHUYIWENHUAJIAN SHE
WENTIYANJIU



线装书局

社科文献论丛第 14 辑/姬汝茂主编

中国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问题研究

何保林 主编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研究 / 何保林主编. —北京:
线装书局, 2009. 6

(社科文献论丛第 14 辑/姬汝茂主编)

ISBN 978-7-80106-968-9

I. 中… II. 何… III. 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研
究—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5338 号

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研究

主 编: 何保林

责任编辑: 杜 语 孙嘉镇

排版设计: 秋 水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 41 号 (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6

字 数: 54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册

定 价: 281.00 元 (全 10 册)

前 言

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性,必须正确地反映自然和社会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必然坚持同自然观、社会观中一切非科学的文化思想进行坚持斗争的立场,为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提供理论依据。论著《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研究》,有助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研究的深化。本书由缘起、文化理念、文化建设方略三部分组成。首先,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环境与现实根据出发,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进行反思,深刻揭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以此作为研究之缘起。其次,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理念诸如伦理文化理念、政治文化理念、公民意识文化理念等进行研究,明确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最后,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略进行研究,规定文化建设的战略与目标、明确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与方法。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部分 缘 起	
第一章 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反思	3
一、中国旧文化及其在近代的根本变化	3
二、海外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11
三、选择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必然性	27
四、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36
第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	47
一、自我扬弃与参照比较：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	47
二、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	69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环境与现实根据	82
一、历史环境	82
二、现实根据	93
三、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95
第二部分 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理念研究	
第四章 中国社会主义的伦理文化	101
一、人道主义的理念	102
二、集体主义的理念	127
三、爱国主义的理念	139
四、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	148
第五章 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理念	170
一、计划与市场两只手的并用	171
二、实现公平基础上的效率主义	185
三、协调、促进竞争中的协作	201
四、要民主，也要权威	214
五、把道德与法制统一起来	224
第六章 中国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文化	235
一、主体意识的历史意义与现实要求	236
二、树立自由意识与人性的完善	245
三、平等意识的基本价值与具体形式	256
四、人权意识与优化人的自然基础	268
五、法治意识的产生条件与现代意义	280
第三部分 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略研究	
第七章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问题	291
一、与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关系	291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	294
	三、在民族团结和统一中的重要作用	297
	四、在综合国力中的重要位置	299
	五、总指针与总目标问题	303
	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创新	315
	七、文化创新的价值	315
	八、文化创新的着力点	320
	九、文化创新的原则和途径	326
第八章	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与道德建设问题	336
	一、认清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合理性	336
	二、坚持与时俱进,实现理论创新	340
	三、在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中彰显理论的科学性	347
	四、从根本上解决全社会的“三观”问题	354
	五、理性把握道德的社会价值	360
	六、社会主义道德的结构与要素	365
	七、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方式和途径	372
第九章	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科学与文化建设问题	377
	一、深化对科学技术作用的认识	377
	二、把握科教兴国战略的实践理性	383
	三、普及科学文化的社会要求与意义	387
	四、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完善人类科学	393
	五、对文化问题的新认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分类	398
	六、实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价值	406
	七、坚定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411
第十章	关于扬弃传统文化与学习外国文化问题	420
	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绵延至今	420
	二、正确对待祖国传统文化	424
	三、观往迹以制今宜	430
	四、取于外以资于内	439
	五、吸收外来文化的原则和要求	445
	六、学习外国文化的长处	451
第十一章	关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问题	456
	一、和谐文化的内涵探析	456
	二、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460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谐社会的灵魂	474
	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研究现状与趋势	493
后 记		506

第一部分

缘 起

第一章 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反思

文化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在任何时代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从前人手里承接历史文化遗产,再经过当代人的融合与创造,然后向下一代人流传。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最彻底的革命,要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同旧制度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新文化也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①但是,社会主义文化对旧文化不是全盘否定的,而是既克服又保留,并且通过对历史文化的“扬弃”和改造,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列宁说得好:“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②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不是脱离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发展的轨道,由某些自命为“超越整个社会”的“天才”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全部优秀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是迄今为止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和有机组成部分。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深厚土壤,把握中国文化的发展规律,弘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

一、中国旧文化及其在近代的根本变化

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文化发展最早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长达五千年之久。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这种文化是随着中华民族的成长而发展起来的,它对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团结、兴盛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具有跨时代的深远影响。我国古代的科技文艺成就如四大发明、诗词歌赋等等,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若干领域的学术思想也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宝库。在当今世界上,凡是炎黄子孙,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只要他良知未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②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页。

都不能不为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化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文化始终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前列。从远古时期炎黄传说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的兴起。后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和近代新学等阶段，中国文化构成了生生不息、环环相扣、经久不衰的思想宝库。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古代文化源远流长，而且博大精深、异彩纷呈。不仅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文艺创作、文物古迹和民风民俗，而且有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教育等方面的思想理论。在上述许多领域，我们的祖先都曾达到当时世界文化发展的高峰。我们很早就有了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许多重要的农作物都是中华的先民最早从野生植物培育而成的，在公元六世纪就总结出了完整的农耕工艺理论。中国古代有举世闻名的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并且是第一个将指南针用于航海的国家。我国至今还保留着世界最早最丰富的古代天象记录资料，而且早在战国时期就编制了恒星表。我国的文学艺术，就其作品的丰富、成就的辉煌和名家的众多来说，在世界文艺史上都占有突出的地位。早在周朝，我国便产生了文学巨著《诗经》，后来，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递相继承又各有创新。著名剧作家关汉卿活动的时代比世界著名的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要早三百年。就小说而论，《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等文学巨著更是闻名世界。我国古代的美术，不仅有《韩熙载夜宴图》、《清明上河图》等杰作和诸多画派名家留下的珍品，还有敦煌、麦积山、云冈、龙门四大石窟和秦陵兵马俑等堪称世界奇观的绘画雕塑宝藏。我国古代的学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经过千百年的繁衍和发展，形成了经史子集等相当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正是儒、法、道、释等丰富多彩的思想流派之间的相互抗拒与渗透，构成中国古代学术内在的充满生机的矛盾运动。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自16世纪以后，西方主要国家相继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民主革命和产业革命等一系列现代化浪潮的洗礼，迅速崛起并取代中国成为人类文明的导航船。从此以后，古老的中国大地在新思潮和中西文化的冲撞中，缓慢地开始了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嬗变，投入痛苦而又漫长的现代化浪潮，以争取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这个广泛而深刻的文化嬗变大致可以划分为旧民主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三个相互衔接的历史阶段，其中每个阶段都在当时社会生活的基础上，既继承了前阶段的思想成果，又有所突破和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准备了思想材料。

众所周知，早在明朝中期以后，东南沿海的城市工商业中就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并且冲击着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和僵化落后的封建社会关系；君主昏庸，吏治腐败，地主的盘剥把中国一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推向了极致，显示出一系列危机衰败的征兆；农民战争和清军入关促使明朝灭亡，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到腐朽没落、自我否定的历史阶段。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以李贽、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戴震、龚自珍为代表的先进思想家，开始对中国封建社会及其精神支柱——正统儒学进行剖析批判，提出了一些反映社会改良和早期现代化要求的新理论、新观点。他们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传统说教和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肯定人的感性欲望和物质私利；反对“崇本抑末”的专制政策和封建科举制度，主张“治生产业”，发展科学技术；他们揭露封建君主专制的罪恶，主张民主议政，限制君权；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传统礼教，宣扬平等、自由和个性解放。所有这些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新因素，既是我国早期现代化要求的主观反映，又是现代化萌发的思想先导，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经过“自我批判”和“破块启蒙”，开始向近现代文化转变。然而，正像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运动遭到封建势力的严重阻碍。始终在封建的经济结构和专制统治的缝隙中求生存一样，中国明清时期新文化的萌芽也遭到封建传统文化的重重围剿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残酷镇压，难以生长发育，不能完成中国现代化早期启蒙的任务。

18 年中英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国开始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开始发生“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方面，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中国传统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逐步遭到破坏，建立在这种经济之上的封建专制制度也随之发生动摇，作为封建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并转过来为之服务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出现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危机。另一方面，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西方文化也涌进中国并和传统文化发生了激烈交锋，显示出传统文化的种种局限和弊端，迫使其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与西方近现代文化进行接触和交流。正如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夕所述：“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扰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接触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按：指‘西教西器’、‘火器历法’、‘制械练兵’之类），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按：指‘行政制度问题’与‘政治根本问题’），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恪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按：指‘自由平等独

立’)。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惛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①这段文字实质上揭示了中国文化在近代沿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观念层面的次序,发生变革的过程与规律。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中国文化发生了器物层面上的变革。与文化的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相比,文化的器物层面是最活跃的因素,易于变动交流。当两种异质文化接触时,双方首先在物器的外在层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鸦片战争开始让中国人见识了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尤其是先进的军事技术。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倡导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和民用科技。到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开始搞洋务运动。洋务派李鸿章认为,“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因而要向西方学习“船坚炮利”,以求“自强”。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在李鸿章之前(1861年)就论述了学习西方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并就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②的见解。该主张实际上成为此后30年洋务运动的纲领。后来,洋务派薛福成也提出:“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③郑观应更明确地说:“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而非孔孟之常经也。”^④“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⑤从总体上看,洋务运动在政治上企图以西方先进军事技术来巩固衰老的封建制度,在文化上企图以西方先进科技来弥补传统儒学的不足。他们懵懵懂懂穷于应变而采取的“以制器为先”的策略,不自觉地符合异质文化交流始于物器的规律,顺应了中国文化趋于务实的潮流。应该说,这是西方近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次激烈交锋时,中国文化基于自己的主导观念对西方文化中的科技器物因素作出的肯定性选择和尝试性借鉴。

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不仅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为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神学和经院哲学,创立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19世纪下半叶中国从西方引进的科学技术也在

①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1卷6号,1916年2月。

②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

③ 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

④ 郑观应:《盛世危言新编·凡例》。

⑤ 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

国计民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逐渐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据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统计,到1895年,共翻译西学书籍354种,其中大部分是科技书籍,也有少量史地、政法类书籍。所翻译的科学书籍已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生物、医学等门类,所翻译的技术书籍包括兵工、造船、铁路、化工、矿山、冶金、纺织、印刷等门类,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译介西学的高潮。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和传播,有力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昔日被国人贬斥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的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逐渐受到人们的认同和尊重,并且闯进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殿堂,推动中国近现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诞生,改变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僵化的社会结构。

1894年甲午战争使洋务派苦心经营三十多年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用严酷的事实宣告了洋务运动及其文化纲领的破产。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批判洋务运动的“诟病”,倡导变革中国封建君主专制之成法,建立资本主义君主立宪政体。到这时,中国文化才由器物层面的变革推进到了制度层面的变革之新阶段。康有为认为,中国之所以“败弱”可欺,是因为中国没有像西洋强国那样“立宪法开国会”,而顽固坚持封建专制制度的缘故。“若夫泰西立国之有本末,重学校,讲保民、养民、教民之道,(设)议院以通下情,君不甚贵,民不甚贱,制器利用以前民,皆与吾经义相合,故其致强也有由。吾兵、农、学校皆不修,民生无保、养、教之之道,上下不通、贵贱隔绝者,皆与我经义相反,故宜其弱也”。^① 洋务派在维护封建专制政体和纲常名教的前提下推行所谓“自强新政”,必然是“根本不净,百事皆非”,“徒糜巨费,无救危败”。只有仿效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强行变法——兴农工商,引进西学,“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②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救亡图强、保国保种的问题。虽然维新变法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软弱无力和封建顽固势力发动“戊戌政变”很快就失败了,但其间对西方政治制度和学术理论的介绍和宣传,使数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君主专制和正统思想发生了动摇。维新派办报纸,立学会,建新式学堂,批判封建专制主义,鼓吹君主立宪,宣扬自由、平等和人权,掀起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浪潮,开始创立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

① 康有为:《保国会上讲演辞》,《戊戌变法》第4册,第409页。

② 康有为:《请定宪开国会折》,《康有为政论集》第338~339页。

1898年“百日维新”和1900年义和团运动相继失败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政治舞台,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发动旨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武装斗争,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从而使民主革命思潮逐渐取代维新改良思想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孙中山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思想宝库中学来了革命进化论,提出了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目标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他在1905年《民报发刊词》中明确地说:“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日民族,日民权,日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①因此,孙中山主张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并举而“毕其功于一役”。翌年,他在《军政府宣言》中又以“四纲”、“三序”阐发三民主义。所谓“四纲”,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三民主义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所谓“三序”,则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这是实现三民主义,创建“中华民国”的战略步骤。

正是在这种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使民主主义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也正是在20世纪初期,以国内新式学堂师生和留日学生为主体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他们译介西方政治学说,开展同顽固派、改良派的论战,直接用新概念、新思想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理论。据《东西学书录》记载,1900年以前翻译的西学书籍中,自然科学类有437部,占总数的75%;社会科学类仅有80部,占有14%。据《译书经眼录》记载,20世纪初期翻译的书籍中,自然科学类仅164部,占总数的20%;社会科学类却有327部,占61%。《路索民论》,《培根文集》,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甄克思的《社会通论》,《美国独立檄文》等一大批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到20世纪初期都陆续翻译出版。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狮子吼》、《猛回头》,孙中山为《民报》撰写的发刊词等革命论着,都不再借助传统文化的旧形式,而是用近现代文化的新形式来直接宣传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新思想,具有更加独立、更加鲜明的新形式和新内容。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不但没有真正实行民主政治,反而出现了袁世凯

^① 《孙中山文集》上卷。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称帝、张勋复辟以及尊孔复古的逆流。以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认识到中国仅有制度层面的变革是不够的,还必须发动全面的思想启蒙,解除传统文化对人们的束缚,确立与民主共和国相适应的现代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掀起了以彻底反传统,改造国民性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和人权的旗帜,向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思想文化、纲常名教发起了猛烈冲击,从而将中国文化变革推进到观念层面的新阶段。陈独秀明确地说:“盖吾人自有史以迄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族;以新民族”。^① 鲁迅比陈独秀更早地抨击晚清见物不见人的“武事”救国论和“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认为西方以富强炫耀天下,只是“现象之末”,其“根柢在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②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认识到孔孟之道、封建礼教“不适于现代生活”,主张树立科学精神,民主意识,平等人权新信仰,自主自由之新人格来推动中国走出落后的“古代文明”,迈向富强的现代国家之路。陈独秀率先批判封建的意识形态,主张以现代文化取而代之。他尖锐地指出:“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③“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在古代社会无价值。不过因他不能支配现代人心,适合现代潮流,还有一班人硬要拿他出来压迫现代人心,抵抗现代潮流,成了我们社会进化的最大障碍”。^④ 民主和科学作为现代文明的两大基本要素,不仅是西方文明的救星,而且“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⑤ 在《敬告青年》这篇著名的启蒙宣言中,陈独秀还开宗明义地倡导“自主”、“进步”、“进取”、“世界”、“实利”、“科学”等现代文化观念,批判“奴隶”、“保守”、“退隐”、“锁国”、“虚

①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新青年》1916年1月号。

②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57页。

③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2卷4号,1916年12月。

④ 陈独秀:《孔教研究》,《独秀文存》卷一。

⑤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独秀文存》第243页。

文”、“想象”等传统思想观念。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他力主现代西方的“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以反对中国传统社会盛行的空玄人生观、专制主义政治和阻碍经济发展的泛道德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而新文化运动正是要深入人们的灵魂，从最内在的、最深层的伦理方面上摧毁传统文化，表现出十分强烈的反传统倾向。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不同，新文化运动不再提中体西用，西学中源，而是力主西学，吐故纳新；不再妄自尊大，动辄尧舜禹汤文武周孔，而是要“打倒孔家店”，将封建文化一举埋葬。它以新时代的科学反对中世纪的迷信，用新兴的民主共和对抗反动的君主独裁，以现代的自由平等人权反对封建的专制等级制度，以独立自由、个性解放的国民性格改造依附盲从、怯懦保守的传统人格，给封建专制主义、封建伦理道德、封建迷信和蒙昧主义以沉重打击。从此以后，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个性解放、自主人格等一系列现代文化的新因素，竞相登上中国思想的舞台，并且逐渐深入人心，为越来越多的民众所认同和接受。总之，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社会思想放出有史以来绝未曾有的奇彩”，在思想界特别是进步青年中破除了封建主义的枷锁，以启蒙运动的火炬，唤起人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和救国救民真理的追求。

然而，由于缺乏科学的、革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主要宣传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不可能找到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的真正出路。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要彻底改变中国现状，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根本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虽然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暴统治，使中国先进人物以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为榜样来改造中国的设想和实践一再破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的尖锐化、表面化，也促使某些激进民主主义者开始产生对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怀疑和失望，但一时又不知道新的出路在哪里。这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①

历史的机遇最终还是到来了。正当中国工人阶级成长壮大，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我们指出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它促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高涨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已经没

① 《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落,必将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社会所替代,一切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都必然要起来争取独立和解放。于是,他们便根据这种新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武器来设计中国的新制度和新文化。正如毛泽东在总结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时所述:“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前者是资产阶级新文化与封建阶级旧文化斗争时期。那时所谓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这些学说虽然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打退了,并失了灵魂,只剩下躯壳了。后者是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新文化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旧文化斗争的时期。这时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①

二、海外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人接触和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就被零星地介绍到中国来了。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开始在中国被系统地介绍和传播。与此同时,西方其他的社会主义思潮或流派也涌入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6~698页。